

太虛大師遺教



西方學者筆下的

# 太虛法師

Holmes Welch 原著  
馮永明節譯

本文節譯自 The Buddhist Revival 的第三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廿五日

明海法師筆下之靈巖雜著

太虛法師，已普遍地被認為是中國現代佛教史中最重要的物。但是他的重要性表現在那裏呢？在他一生中，他大部份精力都用於領導一部份具有新思想的佛教徒。直到他逝世為止，他所有的思想和活動，對於中國整個佛教團體來說，影響並不大。尤其是中共取得政權後，他那僅有的影響力，很可能已在中國大陸本土消逝了。那末，太虛法師的重要性又在那裏呢？我們的答案是：太虛法師代表了中國佛教向歐西國家宗教的挑戰作了反應，以及在中國佛教的現代化問題上作出了回答。

要在太虛法師的德行和缺點上作一正確的評斷，確是不容易的。肯定地說；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有感染力的人。他是一位對自己的宗教有着無限熱誠和忠誠的人。他具有超卓的洞透力，創拓事業的毅力和精神。但他並未有深深地考慮過，中國佛教如果按照他的計劃去改革，它最後還是不是佛教？至少它還是不是中國佛教？

太虛法師是一位很有戲劇性的人物。現在讓我們從頭來看一看他一生所做過的主要事情。

在金山事件失敗後，太虛法師發現自己無論在教內同輩或長輩中，都受着輕視和蔑視，於是在一九一四年十月，他到普陀山

閉關三年。許多人說：他是躲在深山裏對自己錯誤進行反省和沉思。但實際上，太虛法師利用這三年靜居生活閱讀了大量經典，並思維了如何發展中國佛教。無論如何，太虛法師在這三年山居的生活中，並不是把自己和外在世界打成兩截。後期他在佛教的成就，大體上都是這次閉關功用的具體實踐。

一九一五年，政府的「寺廟管理條例」通過了，（原文是：The Monastery Control Regulations）這大大地刺激了太虛法師。他激昂地闡述了他的「整理僧伽制度論」（英文原文：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Sangha System）。這個理論已經蘊結在他心坎上數十年，是他如何推進佛教事業和組織的雄心壯志的縮影。從這一年開始，直到他逝世前夕為止，他先後七次制定和發表了關於他發展中國佛教的計劃，而且每一次計劃的規模都比前一次大。但他一系列發展計劃，却沒有一次（完整地）被實踐過。實際上，他每一系列計劃都是如此地龐大，實在使人難以相信它有認真地推行的可能。例如：他後期許多計劃中的一項，就是要使中國培養出壹萬名大學比丘。他們之間具有四種不同等級的學位文憑，其中有八百位博士比丘——他們都接受了為期九年的正規高等教育。此外，他又計劃要訓練出二萬五千名比丘成為優秀的

佛教工作者（其中九千人擔任佛經講授工作。七千人在醫院中服務……）。再又一小部份比較年長的佛徒，將會分別在六十個不同的佛教道場中修習。每一道場約有一千人左右在那兒修習靜

調法化教育將在各省各地區性的寺院裏加以普及和發展。也許，太虛法師本人已覺察到他的計劃不會得到國內人很大的支持，所以他會說：如果在外國籌到款項，他就會着手實踐他的計劃。

坐和念佛……所有這些計劃，後來實行了多少？則不大清楚。太虛法師的計劃，目的是要把中國僧伽逐步培育成優秀的佛學者和佛教工作者。隨着僧伽的學術水準和弘化質量提高，則那些喪殞齋懺的事情相應地被逐步減少和揚棄，但是他的這計劃似乎也未曾很好地推行過。

根據太虛法師早期的一項計劃，他是要在首都建立一個全國性的佛學中心，一間圖書館，和一間博物館。他計劃把所有的佛像都移進博物館，這樣就可以騰出更多地方用到弘化和教育上去。偶像膜拜和喪祭齋懺的儀式，祇是作某種限程度上形式上的保存，取而代之的是更廣泛的法化教育的推行。並強

出版了佛教季刊雜誌——「覺社叢書」。翌年（一九一九）太虛法師的一位在家弟子，在杭州西湖畔，購置了一所「淨梵院」。於是太虛法師便把「覺社」的總部，由上海遷往杭州。與此同時



一九二九年太虛法師攝於英倫

太虛法師的「整理僧制度論」的主要內容是：要把僧伽的質素提高到更高的水準；「出家人在本質上永遠作宗教性的工作」他說：「僧伽本質地不為政府階層的事業所牽引」。他和章炳麟、王一亭兩人作了若干次商談後，在上海創立了「覺社」。（英文原文：(Bodhi Society)。覺社創立的目的首先是出版刊物以作橋樑，最後用以過度和達成「整理僧伽制度論」的理想。在覺社創立的同時，他

把「覺社叢刊」，從季刊改爲月刊。在一九二一年農曆正月，他又把「覺社叢刊」易名爲「海潮音」，這是中國佛教最持久的定期刊物，一直到現在仍然刊行。

一九二二年，太虛法師展開了他的計劃的第二步——在武昌創立了「武昌佛學院」。他的用意是要使這學佛院起一種「佛教發展」先驅者的作用，由此以影響和推動、創立更多的地方性佛學院。

一九二三年，太虛法師建立了世界佛教聯合會——這是第一個世界性的佛教組織。(World Buddhist Organizations)。這個組織使他代表了中國比丘站出來爲其他國家所認識。但很可惜，這個組織和武昌佛學院一樣，都沒有持久地辦下去，因而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力也隨之變得極輕微。——但「世界佛教聯合會」仍具有它自身的意義；它的意義就是：引發了人們對中國佛教的普遍興趣，並且導出了今天存在的「世界佛教友誼會」。

在「整理僧伽制度論」中，太虛法師原無意特別地計劃要使自己已在國際佛教舞台上扮演一份角色，他這次成立佛教組織的最初動機，似乎是出於某種偶然的機會；在一九二二年，太虛法師的一位信徒——嚴少孚(英文原文：Yen Shao-fu)會到江西省古寧朝拜佛教聖地——廬山。廬山是一座古老的名山，在五世紀，慧遠大師曾在這兒創辦了蓮社，樹立了以禮拜和念佛的獨特的宗教儀式作爲嚴格修道的生活模式。但到了這時候，廬山的佛教風氣已遠不如昔，取而代之的是熱鬧的外國遊客和更多的基督教傳教士在這兒傳播福音。面對這種情景，嚴少孚十分傷感。他立下決心，決定要爲振興這古老的佛教聖地而做些事情。他想盡了方法在附近的大林寺，取得了若干土地，興建了若干座木構建築物作爲講堂。第二年六月十日嚴少孚和太虛法師一同回到廬山，在原先已建成的講堂裏展開一連串佛學演講會。數天之後，一塊用中英文寫着「世界佛教聯合會」的匾牌，由嚴少孚親手懸掛在講堂門口。之後，立即有一位外國客人來訪問太虛法師。這位客人是日本大谷大學教授——稻田圓成。(Professor Inada Ensei of Otani University)。稻田會去武昌佛學院拜訪太虛法師不遇，

然後一直尋訪至廬山。相談之下稻田感到他本人和太虛法師之間大有必要共同地商談一些有關中日佛教的合作，共同在歐美各國弘化佛教的各項問題。這次訪問之後，稻田並留在講堂作了壹次佛學演講，然後離去。

自此之後，一直至八月十一日，整段暑期中，太虛法師的講堂每日都有一至二次佛學演講會；有時候由外國學者擔任，(如名學者 K. I. Reichely)，有時候則由他的弟子擔任(如照一法師——Chao-I)但大多數仍由太虛法師本人擔任。他的講題多數是：「佛學與科學」，「佛學與哲學」等。聽衆連同外國遊客在內，每日約有一百人左右。遊客的聽衆中，其中一位是日本駐九江的領事——江戶千太郎(Edo Sentaro)，江戶每天必到，從不缺席。他這種行爲大大地振奮了太虛法師，所以在夏季佛學演講會結束的同一天，太虛法師便立即去訪問江戶千太郎。他對江戶說：除了稻田圓成和江戶本人之外，並無其他日本人來參加演講會，日本是否可以在明年派遣一些佛學者來參加？江戶答應把這事情轉達東京政府。之後，太虛法師便開始向自己的政府申請，請求准許他在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第一次會議」。

雙方的政府都同意了，於是第一次世界佛教會議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在廬山召開了。到會的中國代表有十人。日本代表有：佐伯定胤(Saeki Teien)、木村泰賢(Kimura Taiken)和水野梅曉(Mizuno Baigyo)等。水野先生在一九〇四年中國比丘面臨「寺廟管理條例」困難的時候，曾協助過他們解決困苦。他並且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翻譯者。

在會議上，他們集中在佛教發展的問題上作了詳細的討論，例如兩國交換學生和老師的問題，兩國與泰國、緬甸小乘國家的友誼關係發展問題，並且計劃更廣泛地把各國佛教組織聯合起來，首先在中國，之後在亞洲，之後聯合至世界各地佛教。在會議結束時，一項公佈發表了，這份「公佈」宣佈「世界佛教聯合會」正式成立。選定了武漢爲大會總部，選出了大會的委員及職員。在整個決議中，最具有實際意義的一項也許是：決定下一次會



議將在翌年在東京舉行。

這項決議被履行了，佛教會議在一九二五年在東京召開。日本充任了這次會議的東道主。這一年太虛法師曾返過廬山一次，但自此之後，不再有任何佛教會議在廬山召開，僅僅是設辦夏季佛學班或英語課程而已，它們的目的在培養若干位比丘去歐洲和美國弘化。一九二六年五月是太虛法師返廬山的最後一次；這次他行程匆匆，停留了約一頓飯左右，拿了幾本書，又匆匆地離去了。廬山「世界佛教聯合會」由此便成了過去。

根據後期資料，我們知道當時參加第一次佛教聯合會的代表中，其中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的有：英國、德國、法國、芬蘭、挪威等代表。他們的名字是：Ai Hsiang-te, K. L. Reichely 等。Reichely 在一九二三年會講述聖經的「約翰第一章」，這一章的內容，當時在中國人看來很具有佛教的意味。也許 Reichely 所選講的文章太好了，所以它一直被在會的俄國、緬甸，及美國代表們談述。這些代表們所代表「佛教團體」的意義，遠不如 Reichely 所代表的挪威佛教。真正的外國佛教代表大概只有日本代表。

在一九二四年，世界佛教會議上曾選出「世界佛教聯合會」委員，其中委員有 Reginal Johnston。他曾出版過一本關於中國佛學的書，但他很難算得上是位佛教徒，事實上他也曾拒絕參加一九二四年的佛教會議。其他委員有梁啟超，但他曾不承認這次選舉。與此同時，其他三個委員是：諦閑法師、印光法師、歐陽竟無先生。但他們也同樣地不承認自己是聯合會的委員。因為當時太虛法師和他們的關係並不好。

可以相信；在本質上「世界佛教聯合會」是日本與太虛法師之間的會議。在太虛法師的教化生涯裏，這是極有意義的一步。因為它顯示出他會怎樣創立和思考佛教世界化和組織化的方向的根本問題。它也同時使我們洞察到太虛法師的內在機動力。他在這次會議中，會對 Reichely 說：「他們許多人中（包括基督教徒），只爲了無知的應酬而到來，我們僧伽中也有一些無知的份子只管在街頭漫遊。他們（指基督教徒）以爲所有佛教徒也都是這樣的類型，並視我們爲無知的異教徒，或是無教養的宗教。現

在我們已經創立了這個會，告訴了他們——他們所想的並非真實」。Reichely 追述這情形時說：「太虛法師的聲音和眼都燃燒着火燄，透出了他內在的悲痛」。——除 Reichely 之外，其他各國在會代表對於太虛法師這一態度都有同樣的感受和敘述。

由於這內在的「悲」和「痛」所激發，太虛法師繼續發展他的佛教組織；繼他的「廬山夏季演講」停頓後，他把講學地點移到北京，並且把「世界佛教聯合會」易名爲「佛化新青年會」，——但這個組織實際上仍和廬山的規模差不多。同年七月，他又再把它易名爲「世界佛化新青年會」。（英文原文：The World Buddhist New Youth Society）。在一九二四年，太虛法師又創立「世界佛教婦女會」，但這個會僅僅是開始而已，以後再也聽不到關於這個組織的任何消息。

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依照上年度夏季會議的規定，太虛法師成立了世界佛教聯合會中國的分會，並命名該會爲「中華佛教聯合會」。（按原文：Chung-Hua Fo-Chiao-hui）當時這個會的總部設在北京廣濟寺內，（英文原文：Kuang-Chi Ssu in Peking）並且以這個「會」的名義，派遣了比丘作爲中國佛教代表參加了在東京召開的「世界佛教東亞會議」。與此同時，太虛法師並努力在全國建立「中華佛教聯合會」的省和地區性的分會；經過若干苦心經營後，四個地方性的分會先後成立了。它們是：中華佛教聯合會河南分會，湖南分會，浙江分會。但是；在東亞佛教會議過後，所有這些「分會」都相繼消失了。在與此同時的另一面，太虛法師覺得「北京佛化青年會」應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弘化隊伍——「世界佛教宣傳隊」（英文原文：Shih Chieh Hsuan-ch'uan Tui）。首先在中國本土弘化工作，再逐漸推廣到歐洲和美國。——這樣決定後，於是許許多多的公函由太虛法師簽署後，陸續發出，送到全國各地的寺院去，呼籲他們支持這項工作。但是發出去的信，如石沉大海，半點回音也沒有。甚至後期（在一九二九年）他創立的「全亞佛化教育社」也因同樣的情形，竟沒有任何表現。

（未完待續）